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观”及其视野下的文化国际影响力

魏海香

摘要：在黑格尔看来，“影响”的实质是一种外在的量变，而其现实性则体现为思维对现实社会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影响”的哲学诠释却主要和他们的社会性、现代性思想相联系，如认为“相互影响”是基于人类现实的社会联系；社会影响与自然影响相区别；影响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的必然的历史结果，是世界历史的应有之义；影响取决于环境等因素；影响虽然是相互的但却是不平衡的；等等。由此实现了对黑格尔影响观的批判和超越。从马克思恩格斯“影响观”视野来看，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四个方面的逻辑规定性：现实的文化交往是文化国际影响力产生的基础；文化体自身的特质和发展程度是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的前提；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释放与增强还取决于环境等因素；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相互性，也具有不平衡性等。

关键词：影响；辩证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文化国际影响力

DOI:10.13658/j.cnki.sar.2020.03.010

作者简介：魏海香，哲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0)02－0089－07

目前，各种影响力问题尤其是文化国际影响力问题的探讨在学界兴起，但遗憾的是，既有的研究论述尚缺乏深入的哲学考察和分析。从逻辑上来看，影响力问题跟“影响观”有关，应是其中的一个子问题，不同的“影响观”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影响力观”。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思想的考察发现，虽然没有关于影响力问题的专门阐述，但是，科学而丰富的“影响观”确实通过他们的具体思想表现出来了。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观”，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科学把握现时代的影响力问题将大有裨益。

从哲学角度来看，“影响观”应该是属于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众所周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观点”，[①]而“联系即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②]然则“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是指事物及要素之间怎样的关系，以及这三个“相互”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却一直以来未能获得充分的展开和论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既是相互联系的具体内容，也是事物自身及事物之间实现联系与发展的具体环节。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事物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化影响力理论构建”(项目编号：15KDA001)。

①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其与相互制约、相互作用间的关系，“我们才能认识现实的因果关系”。[①]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曾出现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但是，黑格尔只强调了相互作用的规定性，认为“相互作用被设定为因果关系的充分的发展”。[②] 因此，本文通过对“影响”问题的这一考察，也将明确“影响”范畴的哲学规定性。明晰了以上问题，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影响观”的系统考察和解读也就有了正确的逻辑起点。

一、黑格尔的“影响观”：外在的量变

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观”创立于 19 世纪中后期，其是对西方近代“影响观”的继承，更是批判。而西方近代“影响观”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因此，对黑格尔“影响观”的考察就构成了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影响观”的前提。

黑格尔赋予“影响”以深刻的哲学考察与规定，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其一，就“影响”的作用方式而言，主张辩证法的黑格尔认为，影响是相互的，而非单方向的作用。黑格尔批判了当时人们认为事物之间不会相互影响的观点，指出“常识（即感觉与理智相混的意识）总认为人们所知道的对象都是各个独立自存的”，[③] 但实际上“这些对象彼此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④] 黑格尔进而主张将这种相互影响的观点扩展到所有的研究中，“同样的观点，可以适用于自然研究，特别适用于有生命的有机体的研究。有机体的每一个别官能和功能皆可表明为同样地处于彼此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中”。[⑤]

其二，就“影响”的实质而言，黑格尔认为，相互影响是相互联系的必然，相互作用则是因果关系的展开。受康德影响，黑格尔认为相互影响是相互联系的必然，也是相互联系的证明，正是因为相互联系，才会造成相互影响。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相互影响较之于相互作用，其并不及后者重要，因为，相互影响是一种外因，不会对事物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相互作用是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体现与展开，才是事物的内因。因此，黑格尔总是将影响同量、外在、形式等范畴放在一起，并认为影响跟量变有关。

其三，就“影响”的程度而言，黑格尔认为，作为量变的“影响”虽然不影响事物的存在，但这种影响也存在限度，当影响超过一定的限度，影响就会成为连接事物从量到质变化的一个表征。“一切事物都是有量的，但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它们的存在。不过这种‘不影响’同时也是有限度的。通过更加增多，或更加减少，就会超出此种限度，从而那些事物就会停止其为那些事物。于是从尺度出发，就可进展到理念的第二个大范围，本质。”[⑥]

其四，就“影响”的现实性而言，黑格尔只承认思想对现实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他指出：“从前人们都以为思想是无足重轻，不能为害的，不妨放任于新鲜大胆的思想。他们思考上帝、自然和国家，他们深信只是通过思想，人们就可以认识到真理是什么，不是通过感官，或者通过偶然的表象和意见所能达到。当他们这样思想时，其结果便渐渐严重地影响到生活的最高关系。”[⑦]“这样，思维便在现实世界里成为一种力量，产生异常之大的影响。于是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思维的威力，进而仔细考察思维的权能。”[⑧]

应该说，黑格尔是近代开始关注“影响”问题的哲学家，他对“影响”的哲学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影响”的认识，并将其从一个普通语汇提升为一个哲学范畴。但是，黑格尔的“影响观”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受其神秘的哲学体系和“绝对理念”思想的影响，黑格尔不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7 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54 年版，第 338、132－133、132－133、338、197、70、70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能正确理解“影响”产生的原因、实质和条件，而是认为“我们直接认识的事物并不只是就我们来说是现象，而且即就其本身而言，也只是现象。而且这些有限事物自己特有的命运、它们存在的根据不是在它们自己本身内，而是在一个普遍神圣的理念里”。[①] 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正确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观，最终实现了对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思辨哲学的批判和对“影响”问题的现实考察，从而科学阐释了“影响”应有的逻辑规定性。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影响观”的批判与超越

作为将哲学视为把人的世界还给人类自己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分析“影响”的方法论上还有着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痕迹，如他们也强调影响的相互性以及影响是促使事物发展的具体作用的环节等，但马克思恩格斯对影响的哲学诠释却主要是和他们的社会性、现代性思想相联系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影响”的逻辑规定性主要体现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而这五个方面实现了他们对黑格尔“影响观”的全面超越。

其一，作为主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基于人类现实的社会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像黑格尔一样抽象地谈论“影响”，而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及关系来对其进行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②]而在建立社会联系的这个过程中，相互影响才会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众多的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③] “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④]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事物没有反影响，他们指出“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⑤]

其二，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影响和自然影响，不但指出了二者的联系，更指出了二者的区别。人类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影响是人类主体对自然客体施加自然影响的前提，对此，他们指出，“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⑥]而社会影响和自然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的，统一于人类生产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⑦]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社会影响远比自然影响要复杂且更难以预测，“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对社会影响无计可施，“就是在这一领域中，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 133 页。
②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24 页。
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8、65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1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4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①

其三，影响是一种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的必然的历史结果，是世界历史的应有之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事物之间的影响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头脑的臆想，更不是什么神秘观念的产物，而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种历史的结果。马克思对此曾明确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②具体而言，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创造了世界市场，创造了各民族国家普遍交往的交通与通信工具，扩展和普遍确立了相似的生产力条件，产生和凸显了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全球性问题，从而使各地域、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成为现实。而这种愈益世界性的相互影响即是“全球化”现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世界历史就是“相互影响”扩展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③

其四，影响能否产生以及影响的程度还取决于环境等因素。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多是间接的，必须经由环境因素的作用。比如，在谈到 1847 年底奥地利为什么会受到德国政治与宗教革命的影响时，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这种鼓动……找到了足以供它施加影响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行业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机会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被种种荒谬条例捆住手脚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上司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受过较高教育的官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感到满意”。④也是因为环境的不同，同样的事物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造成不同的影响，比如在谈到俄国沙皇为什么竟然会对当时的欧洲产生极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⑤

其五，影响虽然是相互的但却是不平衡的。事物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联系和影响是对称的和平衡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体系，其中，在生产方式中居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对非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的影响要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更大，并且发达国家往往是影响的启动方，不发达国家则是影响的被动接收方和追随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现代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⑦

综上所述，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较为完整地解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观”，其立足于社会性与现代性，实现了对黑格尔传统思辨哲学和唯心辩证法的批判和超越，最终将“影响”问题构筑于现实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之中。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考察当代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99 页。

②③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87、540－541、680 页。

④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0、3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5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种“影响力”问题，尤其是“文化国际影响力”这一目前学界热议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逻辑规定性

近年来，由于全球文化竞争愈演愈烈，文化国际影响力问题日益凸显，受此影响，学界有关文化国际影响力问题的论述也日益增多。但是，既有论述却缺乏对“影响”“影响力”问题等的哲学分析，致使学界对“文化国际影响力”问题的相关研究欠缺应有的理论深度和论证依据。在之前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影响观”的基础上，下面试对“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质进行逻辑推导，并认为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逻辑规定性。

其一，现实的文化交往是文化国际影响力产生的基础。文化国际影响力是指一个文化体在国际文化交往中，通过运用吸引、说服、引导、市场占有、感召等柔性的非强制性方式，改变被影响者的意愿和行为，从而实现该文化体被高度认同的能力和力量。从逻辑上看，文化影响力是基于文化影响的存在，而文化影响是基于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文化交往而产生的。文化交往是指不同文化体之间出于一定的需要所建立和发展的相互联系的文化活动。只有通过文化交往，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文化联系才能得以建立，相互间也才可以释放和发挥文化影响力，孤立的文化体不存在文化影响力问题。文化国际影响力则必须基于国际文化交往的建立，而这种国际文化交往的建立既不是单纯人为主观努力的结果，也并非自然而然地出现，因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① 也就是说，国际文化交往的建立是基于生产的国际化和经济交往的国际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观”，这种国际交往是一种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的必然的历史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交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② 而文化交往的程度决定了文化联系的程度，因此文化交往的程度也就决定了文化影响的程度，即文化交往越频繁，文化联系越紧密，文化影响越多，文化影响力也才可能越大；反之亦然。

其二，文化体自身的特质和发展程度是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的前提。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是每个文化体都具备的能力和力量。无论从逻辑还是历史来看，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文化体才会形成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大体而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质或条件：一是文化具有独特性。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特性，在别的国家眼中充满了异国情调，无疑就会对其他国家的民众具有吸引力，就会激起其他国家民众了解和接触这种文化的愿望。这是民族文化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首要条件。但是这种“异国情调”的吸引力是有限的，且会随着旅游和电视节目的传播而日渐式微。二是文化具有先进性。从每个文化体的总体来看，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是，从文化的具体内容来看，每个文化体都会包含有先进和精华的方面，也会有落后和糟粕的成分。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文化的先进性主要体现为符合先进生产方式和人类文化未来发展趋势的文化的特性。一个文化体包含的先进性成分越多，说服力和吸引力就越大，其他国家自然就愿意接受和效仿，故可以形成持久而强劲的影响力。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与这一阶段居主导地位的先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内容才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目前,在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创的工业文明时代,现代文化是先进文化,因此,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主导力量体现为现代文化的影响力,从现代文化观念的全球普遍确立到现代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三是文化具有感召力。文化仅仅有先进性还不够,例如,美国文化在某些方面比较领先,但由于"文化霸权主义"的做法引起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感,对其文化影响力的发挥反而造成了很多限制。而北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文化也许在某些方面不如美国,但同样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观念和方式具备感召力。文化感召力更多的是靠文化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获得的,实施对外援助尤其是对外文化援助,就是一个增强文化感召力的好的渠道。挪威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其对外文化援助覆盖国家和地区已达 158 个之多。① 四是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度。所谓的文化认同,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对另一个民族国家文化能形成普遍的共识,进而获得这个国家民众的认可和接受。除了先进文化具有高的认同度之外,相互之间达成的文化共识程度越高,其认同度也越高。而那些能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观念,其共识程度最高,认同度也最高,发挥的作用越大,影响也就越大。例如,我国近年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文化理念,因此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并被联合国写入决议。五是文化具有大众性。文化大众性的实质是文化商品化和娱乐化。在当今社会,占据世界文化市场的主流文化是最具大众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具备了时尚性、流行性和消费性。而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这种大众文化的基础,可以说哪个国家掌握了文化创意产业,就掌握了世界文化市场,也就拥有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其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释放与增强还取决于环境等因素。文化国际影响力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而能否产生预期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文化体自身的特质和所具备的条件,还取决于影响者和被影响者所处的各种环境,比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② 可见,物质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及其发展程度决定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及其发展程度。就文化国际影响力而言,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越发达,综合国力越强,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弱。同时,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经济环境类似的国家,其在文化观念的性质上也较为接近,相互之间的文化影响也就较为容易,反之则相对较难。一个文化体文化影响力的释放与增强还会受到被影响者政治因素即政治环境的影响。比如,会受到被影响者民族国家利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影响,如果这种文化影响适应被影响者的政治环境,其影响就会顺利得到实现或增强;但是,如果这种文化影响不适应被影响者的政治环境,就会受到抵制或遭遇阻碍。例如,我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常常会在西方国家引起误读和偏见,致使不能发挥预期的影响。此外,文化环境对文化国际影响力也有重要作用。文化国际影响力有一个适境性问题,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释放需要适应被影响者的文化环境,比如,要适应对方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只有契合被影响者的文化环境,文化体才会真正产生影响力。而如果与被影响者的文化环境不契合,影响力就会受损,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比如,美国文化在阿拉伯国家一直未能取得预期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对方与其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所以,现在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一命题的成立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建立在对文化进行适境性转

① 《挪威如何开展对外文化传播》,http://www.sohu.com/a/126141569_5343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4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化，也就是本土化转化的基础上。

其四，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相互性，也具有不平衡性。正像物理学所揭示的，这个世界所有的“力”都是相互的，文化国际影响力也同样如此，当一个文化体对其他民族国家实施影响力的同时，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也一定会给予这个文化体一定的反作用力，即反影响。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观”所揭示的，文化影响作为一种社会影响，其与自然影响是不同的，其中一个差异体现为自然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大小同等，只是方向相反。而文化国际影响力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程度不一定同等，且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影响程度的不平衡。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常态，而由不同文化影响力的不平衡到彼此间的相对平衡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体现了文化进步的过程。因为，不同文化的发展程度不可能是一致的，虽然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是就文化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及其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言，必然有先进落后之别。而当包含先进成分较多的文化和包含先进成分较少的文化进行交往和交流的过程中，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一定会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观点，“实力的非对称性会导致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①]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由于在文化上具备了现代化的先行优势，也由于其强大的文化产业优势和文化传媒优势，无论在世界文化市场的占有率上还是在文化观念的传播力上都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其文化国际影响力明显大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这种不平衡性是发展变化的，处于非主导地位的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同样可以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亦会对文化国际影响力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会愈益获得广阔的空间，进而对世界文化秩序的变革产生影响，为文化国际影响力格局不平衡性的改变发挥作用。而要真正实现各文化体影响力的全面平衡则要寄望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各文化体才会基于社会和个人的充分发展以及自主的文化交往实现充分而平等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到那时，文化的“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②]

〔责任编辑：李　欣〕

① 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77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